



文 學 / 滄海叢刊 / 東大圖書公司印行



陶淵明評論

李辰冬著

再版自序

這部「陶淵明評論」初版於民國四十五年十月，由中華文化事業委員會印行。嗣因該會改組，停止「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」的印行，故此書於十七年中未行再版。今得該會主任委員張曉峯先生慷慨，將版權「由作者收回自行處理」，深為感激！此書得由東大圖書公司再印，實為張公之賜。

本書出版後，頗得學術界注意。廉齋先生於「自由中國」(第十六卷第三期)介紹說：「李辰冬先生的『陶淵明評論』是一部值得注意的好書」。最後他又說：「陶淵明評論，我不妨再說一遍：這是一本值得注意的好書」。廉齋先生至今尚無緣謀面，亦不知其為何許人，承他這樣推崇，銘感五衷。王聿鈞先生於臺灣「新生報」(民國四十六年一月十四日)以標題「文學研究新途徑的開闢：陶淵明評論讀後感」說：「李辰冬先生繼『文學新論』與『文學與生活』兩部書後，又完成他的『陶淵明評論』，這是李先生十數年來研究的心血結晶。不但歸還了陶詩的真面目，而且替文學研究開闢了一條新途徑。其中有很多的創見，也指出前人對陶詩的許多誤解」。

蘇雪林先生於「革命文藝」說：「自由中國文藝創作頗呈蓬勃之觀，學術論著則寥寥可數。這種偏枯的現象，從任何角度來看，都是不好的。自從前年李辰冬先生以堂堂二十萬字的『文學新論』出版，一潭死水般的學術界才激起了一個巨大的浪花。去年又出版了『文學與生活』，今年又出版了『陶淵明評論』。他最後的這部書比之『文學新論』，範圍有廣狹之不同，但內容之透徹精深，則有過之無不及」。已故王偉俠先生也有文在「暢流半月刊」評介。這四篇固然在介紹拙著「陶淵明評論」，同時又提出了他們的意見，對陶淵明研究，頗有幫助，故附於此書之後。

此書出版後，頗有影響。喻翔安先生的「陶淵明研究」，方祖燊先生的「陶潛詩箋註校證論評」，黃仲崙先生的「陶淵明作品研究」，均有引用，尤以前者引用為最多。黃守誠先生的「曹子建研究」，鍾京鐸先生的「曹子建作品分期之研究」、「曹子建詩研究」，簡明勇先生的「杜甫七律研究與箋註」，亦受此書「陶淵明作品繫年」的影響。我相信：作品繫年將成為研究作品的重要方法，不能不說是此書開始的。

因為「陶淵明作品繫年」中頗有疏漏，故又作「陶淵明作品繫年補正」一文，今亦附錄於後。沈謙君讀書最為細心，特請他作最後一校，至為感激！

初版自序

這部「陶淵明評論」的完成，在我算是釋了一個重擔；這個重擔，讓我揹負了快二十年。

民國二十七年，對日抗戰的第二年，我避難江西萍鄉上南坑。上南坑處於兩山之間，風景幽美，人情敦厚。那時心曠神怡，日與村農爲伍，閒居無俚，借到一部「陶靖節集」來讀。這裏雖不是面臨廬山，背依大江的栗里，但習俗人情，山水景物，與栗里相去不遠，此時此地來讀陶詩，特別感覺親切。當時正草「三國水滸與西遊」、「文學與青年」等書，本擬將這幾部書完成後，再從事「陶淵明評論」的寫作；突得某種因緣，我到重慶去當公務員。於是一隔十年，「陶淵明評論」的寫作也就擱下了；然仍無時無刻，不想完成這個夙願。

我在機關裏混了十年，就讀書寫作來說，自然是損失；但就人生的體驗來說，勝讀十年書。我國作家，多有用世之志，卽令「隱」，也由於作官不得志或由宦場裏栽過跟頭來的。欣賞中國文學，如果沒有嘗過宦場滋味，就無法深切地欣賞。我在機關裏越混越乏味，越混越苦惱，真如陶淵明所說的「冰炭滿懷抱」，於是毅然決然於三十七年暑期由北平直飛邊遠的蘭州。朋友們都很奇怪，教書不在北平而到蘭州，不是遷喬木而入幽谷麼？實際上，我還覺得飛的太近，真想離開那見不得的社會愈遠愈好。國立西北師範學院在蘭州十里店，面臨黃河而背依董山，黃土漫

一天。住室是一丈見方的草廬，除桌椅板床外，一無所有。可是，我處之怡然。記得剛到那裏時，有兩個月工夫都不願看報，其快樂真如陶淵明說的：「久在樊籠裏，復得返自然」！這時，再讀陶詩，又發現了新的意境。原來十年前所瞭解的，完全是他的「靜」態，現在纔能欣賞到他的「動」態；而他的偉大處，就在由「動」止「靜」後的造詣。祇由「靜」或「動」的一面來看陶詩，都不能得到他的真意。

由於喜歡陶詩，也就拿來作為西北師院「文學批評」班的研究對象。無意中，看陶集許多篇詩都標明甲子，我就按照甲子把他的作品作一繫年，沒有甲子的，按照詩裏所提的年歲或事實，都排在甲子之下。這樣一來，使我有驚人的發現。從此，走上了我自己的文學研究途徑。作了作品繫年後，我發現：

第一、前人認為有故國舊君之思的詩，原來都在晉朝未亡以前的二十多年所寫，試問：晉還沒有亡，故國舊君之思從何而來？還有其他許多捕風捉影，尋摭附會的解釋，作了繫年後，都可徹底加以澄清。我又將這種繫年的方法用在曹植、杜甫、李白的作品後，一樣得出許許多多驚人的發現，同時，也發現許許多多前人的誤解。

第二、按着繫年，將作品讀了幾遍後，我發現了陶淵明的境界。他是從「猛志逸四海」開始，經過「冰炭滿懷抱」、「復得返自然」而達到「不覺知有我」的地步。我又將這種方法用到其他許多作家，一樣發現了他們的境界，雖說不一定都是四個階段。

第三、依據陶淵明的四種境界作標準，將他前後的作家一個挨一個來比，我發現了「陶淵明的時代」。「陶淵明的時代」發現後，又引導我用作家與作家的比較方法發現了中國文學史的五個時期：一是「歌謠時期」，二是「宗經時期」，三是「詠懷時期」，四是「傳奇時期」，五是「平話時期」。

第四、將陶淵明與他前後作家比較的結果，我發現了一位作家在同時代裏為什麼有造詣高低之分。所謂同一時代，就是由同一理想出發，然當實踐這個理想時，又由於個性、環境、思想、宗教等等的不同，於是產生不同的造詣。換言之，就是理想愈大，毅力愈強，則感受的生活必愈深刻；生活愈深刻，則作品的造詣必愈超越。

第五、作家與作家比較的結果，我又發現作家的性格都是耿介的。也就因為耿介的性格而使他成為文學家，並且由於耿介的程度而形成他在文學上的造詣。耿介的人不一定都是文學家；然真正的文學家沒有不是耿介的。

第六、也是由作家與作家的比較，我發現了中國文學史的各個時期所以形成的種種因素。更由此，我真正瞭解了社會的、政治的、教育的、思想的、宗教的、經濟的、道德的種種因素是怎樣與文學的時代相配合。

第七、從陶淵明的作品，從陶淵明的四種境界，我發現他的生活是由一種理想，一股理智，一股毅力，一步一步實踐出來的。由此，我瞭解文學裏的情感不是衝動的、自私的、盲目的、瞬

間的；而是理智的、普遍的、個性的、永久的。這種情感，與一般的情感不同，故另名之曰「意識」。文學所表現的既不是一般的情感，而籠統說「文學是情感的表現」就不甚恰當了，此所以我將這句話改爲「文學是意識的表現」的緣故。由意識的觀點來研究作家或作品，好像一把全能的鑰匙，可以打開任何作家的心靈，同時也是評判作品的最好標準。這一點，是我研究陶淵明的最大收穫。

由於陶淵明的研究，我發現了以上幾點，而這幾點是我這些年來的研究方向，「文學新論」與「文學與生活」就是研究工作的初步報告。這部「陶淵明評論」是我走向自己道路的第一部著述，打算再過幾年，我的學業稍微有點成就時，把它出版；可是五十之年，忽焉已至，以現代人的眼光看來，五十歲本不算什麼；但是這個「半百」之年，也足使人警惕，故把它整理出版，以資奮勉。

按照繫年，我將陶淵明的作品重新作一編次，名曰：「新編陶靖節集」，附在本書之後，以便讀者取證。再者，陶詩看來很平淡，而意味極爲深厚，瞭解起來頗不容易，加上以往的種種誤解，使陶詩的真正面目往往掩蓋，所以這本書裏，凡引陶詩的，都加詳細的解釋。這是表明我個人的瞭解程度，至於錯誤之處，尚乞讀者惠正！

中華民國四十五年八月二日李辰冬序於臺北，時年五十歲。

陶淵明評論 目錄

再版自序

初版自序

第一章 陶淵明作品繫年……………一

第二章 陶淵明的個性……………三一

第三章 陶淵明的境界……………五三

第四章 陶淵明的時代……………七五

第五章 陶淵明的藝術造詣……………一〇七

第六章 陶淵明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……………一三五

附 錄

一、新編陶靖節集……………一六七

二、陶淵明作品繫年補正·····	二一
三、李辰冬著「陶淵明評論」·····	二二五
四、「陶淵明評論」讀後感·····	二二九
五、「陶淵明評論」讀後感·····	二三三
六、讀「陶淵明評論」後·····	二三九
廉 齋·····	
王聿均·····	
蘇雪林·····	
王偉俠·····	

陶淵明評論

第一章 陶淵明作品繫年

作品繫年是作家研究的基石。知道了作品是什麼年齡，什麼年代，什麼環境所寫，對作品纔能有真切的瞭解。就拿陶淵明來說，歷來的人都說他有故國舊君之思；作了作品繫年後，纔知所謂故國舊君之思的詩，都寫在晉朝未亡以前。試問：晉還沒有亡，故國舊君之思從何而來？再者，他的「和劉柴桑」詩說：「弱女雖非男，慰情良勝無」，舊日的解釋都說「弱女」諭醢酒，家貧，飲不起好酒，聊以薄酒自慰，從而讚美他「巧于處窮」。作了作品繫年後，纔知他這時快三十歲了，只有女兒，還沒有兒子，盼子心切，在不得已中，才說「弱女雖非男，慰情良勝無」，並非比喻。這類的附會很多很多，作了作品繫年後，一一都被發現。所以作品繫年，是作家研究的最起碼工作。要不然，對作品的瞭解，就建築在沙灘上。

在中國，作家研究常取年譜的形式。年譜的主要目的在考訂事跡，並不注重每篇作品的年

一月。即令將作品繫入，因目的不在作品，故往往產生錯誤。如梁啟超的「陶淵明年譜」將「命子詩」繫於二十一歲條下，就是一個大錯。「命子詩」爲長子儼命名而寫，梁啟超說：「篇中云『日居月居，漸免於孩』，用論語三年免懷語意。言『漸免』，則未滿三歲也」。因此，他假定儼生於陶淵明十九歲。可是「命子詩」說：「顧慙華鬢，負影隻立。三千之罪，無後爲急」。十九歲就得了兒子，二十一歲時，怎麼還能講：「三千之罪，無後爲急」呢？詩又明言：「顧慙華鬢，負影隻立」，即令陶淵明少白頭，十九歲的人也不能這樣講吧！作了繫年，纔知道這首詩寫於三十歲以後，那末一切情調都感覺自然了。作品繫年是以作品爲主，而以生平事跡來註解作品，使生平與作品，作品與生平打成一片；不像年譜那樣以生平爲主而忽略了生平與作品的關係。研究作者生平的目的，在幫助作品的欣賞。而所謂「欣賞」，是要與作者的情感起共鳴。一定得透過作者的生活，發掘作者的情感而與之共鳴，纔算是欣賞。這樣說來，一般年譜，祇是知識的供給，並未注意作品的欣賞。繫年作的愈精，對作品的瞭解愈深刻，此其所以我們開宗明義第一章，就寫「陶淵明作品繫年」的緣故。

談到作品繫年，最先要解決的問題，就是陶淵明的年歲。他的年譜很多，有宋吳仁傑的「靖節先生年譜」，王質的「栗里年譜」，張綰的「年譜辨證」，清丁晏的「陶靖節年譜」，陶澍的「靖節先生年譜考異」，都是根據史傳，認爲他享壽六十有三。獨梁啟超的「陶淵明年譜」，由本詩的證明，認爲祇有五十六歲。我所根據的就是這個歲數。至於爲什麼採取這個歲數，於繫年

中逐條都可證實，用不著在這裏說明。（請參看附錄（二））。依照五十六歲的說法，陶淵明應生於晉簡文帝咸安元年辛未（西曆三七二），死於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（四二七）九月。

他有一首「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」，開頭說：「弱齡寄事外，委懷在琴書。被褐欣自得，屢空常晏如。時來苟冥會，婉轡憩通衢。投策命晨裝，暫與園田疎」，足證他當鎮軍參軍是初仕，以前並沒有作過官。然他是那一年始作鎮軍參軍呢？沒有明言。可是「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」第二首說：「久遊戀所生」，庚子歲是晉安帝隆安四年（四〇〇），那時他二十九歲，已經感到「久遊」。「久遊」多少年呢？他又有一首「還舊居」說：「疇昔家上京，六載去還歸」，據陶對於「上京」下引綠君亭本說：「一作上荆」；從這個「上荆」二字可得消息。上荆就是荊州，也就是江陵。然為什麼稱「上荆」呢？因為江陵在長江上流。他在「祭程氏妹文」說：「昔在江陵，重罹天罰。兄弟索居，乖隔楚越」。足證他曾在江陵住過家。不但住過家，而且還在那裏「重罹天罰」。「天罰」當指父母之喪，既言「重罹」一定是又遭父或母之喪。那末，本文又說：「慈妣早世，時尚孺嬰。我年二六，爾纔九齡」，可知母親已於他十二歲時逝世，在江陵死的當然是他父親了。也正因為喪父，纔使「兄弟索居，乖隔楚越」。「祭程氏妹文」寫於他三十六歲，那時他已歸田二年。他於三十歲時還有一首「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」又說：「遙遙至西荆」。「西荆」就是「上荆」，因為它在北京都之西。他為什麼赴江陵呢？因為假期滿了，得回任所，故一方面於題中標明「赴假還江陵」，另一方面於詩中又說：「懷役不遑寐，

中宵尙孤征。商歌非吾事，依依在耦耕」，足證他是爲出仕而赴江陵。如此講來，江陵不是他出仕之所麼？他一生祇出仕過三次，一是鎮軍參軍，二是建威參軍，三是彭澤令，而鎮軍參軍是他第一次出仕。他作鎮軍參軍既在「上京」，那末，「還舊居」詩說：「疇昔家上京，六載去還歸」，足證他已作了六年鎮軍參軍，故稱「久遊」。他是庚子歲還舊居，從庚子上推六年，即晉孝武帝太元二十年乙未（三九五），那時陶淵明二十四歲，故「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」當作於此年。

以前的人沒有將「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」、「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」、「還舊居」、「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」四詩連到一起來看，祇看見「疇昔家上京」的「上京」，就在這兩個字上下功夫，於是愈考證愈把問題搞糊塗了。有的引「朱子語錄」說：「廬山有淵明古迹處曰上京。淵明集作京，今土人作荆。江中有一盤石，石上有痕，云淵明醉臥其上，名淵明醉石。按廬山記：『淵明所居栗里兩山間，有大石，可坐十數人。淵明嘗醉眠其上，名曰醉石』。上京、栗里、蓋近在一處也」。庶未思：上京、栗里既在一處，而庚子歲五月中所還的舊居就是栗里，可是詩言：「行行循歸路，計日望舊居」，明言已經走了許多天，計算著日子就到了家鄉。假如上京、栗里近在一處，何用計日呢？詩又言：「誰言客舟遠，近瞻百餘里」，眼看到了家還有百餘里，上京、栗里有百里之遙麼？又有人引南康志說：「近城五里，地名上京，有淵明故居」。南康郡在今江西贛縣西南，他家住在那裏作什麼？（註一）這種注釋都是不從作品

的內容着手，祇看到一個同樣名稱，就尋摭附會，使問題永遠得不到解決。如果把作品作一繫年，前後脈絡就可找到了。

陶詩裏有兩首極為不類的詩：一是「詠三良」，一是「詠荆軻」。因為這兩首詩的風格豪放，從來的解釋，都說它們有故國舊君之思。乍一看來，很有道理；但將陶詩通體作一繫年後，這種解釋就大有問題了。

「擬古詩」說：「少時壯且厲，撫劍獨行遊。……飢食首陽薇，渴飲易水流」（第八首），「三良」、「荆軻」二詩正是表現少時心胸。一則說：「彈冠乘通津，但懼時我遺。服勤盡歲月，常恐功愈微」；再則說：「雄髮指危冠，猛氣衝長纓。飲餞易水上，四座列羣英」，都是「壯且厲」的胸懷。「雜詩」也說：「憶我少壯時，無樂自欣豫。猛志逸四海，騫翮思遠翥。荏苒歲月頽，此心稍已去」（第五首），壯心稍去的意思，就是意識上起了矛盾，然還不到決然拂衣的地步，所以接著說：「值歡無復娛，每每多憂慮」。作鎮軍參軍、建威參軍時都有詩敘述他的矛盾意識，直至作彭澤令八十幾天決然歸田後，意識上又復一致。「雜詩」又說：「日月擲人去，有志不獲騁。念此懷悲淒，中曉不能靜」（第二首）。這也是述少壯時的心情。陶淵明少壯時必定有一種理想，一種志願，抱著滿腔熱血去作官，而一入宦場，實際上一切都幻滅了，於是心理上起了變化。他開始作官並不是專為貧，主要的為實現自己的理想，所以「詠三良」的末尾說：「良人不可曠，泫然沾我衣」！「詠荆軻」的結尾說：「其人雖已沒，千載有餘情」。陶淵明詩都有隱的意識，獨這兩首不然，也足證明這兩首詩作於意識未矛盾以前。

一般注釋家都認為這兩首詩作於秣陵之變的時候，果如此，詩意就不可瞭解了。程穆衡解釋「詠三良」詩說：「此詩言彈冠通津，則懼遺我；及服勤既久，又無功可稱，乃謬爲君之所私。出入必侍，計議必從，如此而一朝有故，欲不死得乎？意謂秣陵之變，利其祿者當殉之。若夫久去職之遠臣，則所謂人有君而弑之，我焉得死之者也！」他簡直沒有看懂詩意。詩言：「彈冠乘通津，但懼時我遺。服勤盡歲月，常恐功愈微。忠情謬獲露，遂爲君所私」，都是積極的意義，正面的直陳，毫無譏諷反側的含意。「服勤盡歲月」是用「禮記」：「事君有死而無隱，服勤歲月」的成語，也就是諸葛亮說的：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」的意思。「常恐功愈微」是想積極建功，毫無「服勤既久，又無功可稱」的反意。因爲有「服勤盡歲月，常恐功愈微」的「忠情」，纔有「遂爲君所私」的結果。照程氏的解釋，既是「服勤既久，無功可稱」，爲什麼轉爲「君之所私」呢？詩又言：「出則陪文輿，入必侍丹帷。箴規嚮已從，計議初無虧。一朝長逝後，願言同此歸。厚恩固難忘，君命安可違？臨穴罔惟疑，投義志攸希」。「願言」、「固難忘」、「安可違」、「罔惟疑」、「志攸希」都是肯定的語調，絕無「欲死不得乎」的猶豫意味。至如程氏的最後幾句：「若夫久去職之遠臣，則所謂人有君而弑之，我焉得死之者也」，更是不知所云。陶澍又注說：「此悼張禕之不忍進毒，而自飲先死也」，更是捕風捉影，摸不著邊際。至於「詠荆軻」一詩，蔣薰注說：「摹寫荆卿出燕入秦，悲壯淋漓，乃知潯陽之隱，蓋未嘗不存子房博浪之志也」，都是受了「故國舊君之思」的主見所蒙蔽。（這兩首詩的意義，第三章裏有詳細的解

釋，請參看）。

陶淵明的境界可分四個階段：一是「猛志逸四海」；二是「冰炭滿懷抱」；三是「復得返自然」；四是「不覺知有我」。陶淵明再三說：「弱齡寄事外，委懷在琴書」（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）；「少年罕人事，遊好在六經」（飲酒）。「六經」、「琴書」，正是培養他「猛志逸四海」的心胸。可是他一入宦場，馬上就感覺到仕與自己的性格不合，所以他在「歸園田居」說：「少無適俗韻，性本愛丘山。誤落塵網中，一去三十年」。（「三」應作「已」，辨正在該詩條下）。「塵網」就是仕網。他一開始作官就「望雲慙高鳥，臨水愧游魚」，愈作愈感到與自己的志趣不合，所以我們稱這十年階段為「冰炭滿懷抱」的時期。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之下，作了八十幾天彭澤令後，毅然決然，拂衣歸田。歸田後他的心情又回到自然，於是他高聲歡呼說：「久在樊籠裏，復得返自然」！所以我們就稱這一階段為「復得返自然」的時期。歸回自然後，他的心境再為培養，一直達到無我的程度，我們稱最後這一階段為「不覺知有我」的時期。如果讀者按照我們作的作品繫年，將陶淵明的詩細心讀一遍，就可發現除將「詠三良」、「詠荊軻」二詩排在始作鎮軍參軍以前，沒有地方可以安插。因此，我們斷定這兩首詩寫在始作鎮軍參軍之前。至於前多少年，那就不必再為猜測了。這兩首詩的問題一解決，就可按照陶淵明的年歲，將他的作品一一排在他的歲數下邊了。

晉孝武帝太元十七年壬辰（三九二），二十歲。

詠三良一首

詠荆軻一首

這兩首詩不一定恰恰作在此年，不過二十歲左右的人，正是雄心勃勃，幻想豐富的時期，故列於此。

太元二十年乙未（三九五），二十四歲。

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一首

此詩爲二十四歲時所寫，說具前。

晉安帝隆安四年庚子（四〇〇），二十九歲。

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二首

還舊居一首

「從都還」說：「行行循歸路，計日望舊居」，故知「還舊居」爲同年所作。

悲從弟仲德一首

詩言：「衡哀過舊宅」，「舊宅」也就是「舊居」。又言：「門前執手時，何意爾先傾」，足證他曾離開了家鄉，及至回來的時候從弟已死，故有此作。

和劉柴桑一首

劉柴桑就是劉程之，字思仲，曾作柴桑令，故稱劉柴桑。「蓮社十八賢傳」說：「劉程